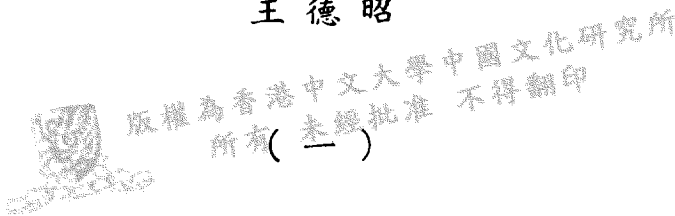




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

王德昭



辛亥革命始於武昌新軍起義，湖北獨立，他省響應；而為這次推翻滿清、肇建民國的革命佈置經營的，是中國同盟會的活動。

正統的中國國民黨史以同盟會上接興中會，因為不僅孫中山先生的領導在這兩個革命組織間一脈相承，而且在同盟會成立後，繼續追隨中山先生的舊興中會員也都曾加盟為同盟會員。¹但如從同盟會的主要組織成分、活動方式、與活動對象視之，則同盟會無疑不同於興中會，而為一個新的革命組織。老同盟會員如鄧家彥便曾稱同盟會為「一個開天闢地創造的革命大團體，」說它「與興中會無嗣續之關係。」²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興中會在惠州舉兵失敗。當年，興中會的一個領袖楊衢雲在香港被刺殞命；次年，它的又一首要鄭士良亦死。在惠州之役後，當年雖又有興中會員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德壽的事件，二年後（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有洪全福、李紀堂等人的謀舉兵廣州，但前者祇是革命黨員的個人的行動，而後者也非興中會的本部所策動。興中會的活動大體陷於停頓的狀態。³中山先生自己也說：「興中會自惠州一役失敗後，極少收攬黨員。」⁴

1 參閱馮自由「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五至六五。民國五十八年重印本，台北。

2 鄧家彥「由同盟會說到南京政府」，中國一週。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台北。

3 馮自由「興中會組織史」，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〇。

4 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頁三二。民國五十八年重印本，台北。

惠州舉兵後於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二年，後於康、梁在日本組織保皇會一年。從惠州之役至同盟會成立的五年間，有兩項重大的變化影響革命的形勢：一是興中會在海外華僑社會中所建立的基地，十、九為保皇會所奪；一是國內外的中國知識青年，對於國事的關心越來越普遍熱烈。興中會在海外華僑社會所建立的基地，主要是在日本橫濱和美國夏威夷檀香山。康有為的弟子徐勤、陳蔭農等人，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冬應橫濱華僑之聘，至橫濱創辦大同學校，尚係經中山先生的介紹。但康派既得大同學校為憑藉，勢力日張，孫康兩派在橫濱華僑社會中的地位遂「漸成反客為主之局。」迨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和康有為先後逃亡至日本。有為旋遊歐美，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夏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橫濱繼之也有保皇分會成立，以啟超所創刊的清議報為機關報，「大倡勤王之說。」橫濱華僑中的舊興中會員，一時幾乎盡為保皇會所吸收。⁵至於檀島方面，檀香山為興中會的發祥之地，⁶但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五年冬去檀，立保皇會，檀島華僑入會者，至於「十人而七，」從此「檀島興中會員多為保皇會所用，與橫濱興中會員如出一轍。」⁷啟超於其庚子（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自檀島致康有為的函中，便會說「此間保皇會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舊黨。」⁸即如國內會黨，庚子保皇會有長江自立軍勤王之役，興中會有惠州之役，而畢永年為興中會所羅致的湘、鄂哥老會頭目，結果卻竟為保皇會所用。⁹

在海外華僑社會中所建立的基地的被奪，削弱了興中會的地位。中山先生自己說：「由乙未（廣州之役）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之時代也。」

- 5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二三至二六。民國四十五年重印本，台北。又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以下簡稱開國前史），第一冊，頁四一至四二。民國四十三年重印本，台北。
- 6 興中會最早創立於何地，有澳門與檀香山二說。前者以鄭魯倡之為最力，見其所著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二。民國五十四年重印本，台北）；後者以馮自由倡之為最力，見其所著「興中會始創於檀香山之鐵證」一文（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四至三〇）。本文從馮說。
- 7 馮自由開國前史第一冊，頁四八。
- 8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梁年譜稿）卷九，頁一二四。民國四十七年，台北。
- 9 狄楚卿（葆賢）「述任公先生事略」，轉引自梁年譜稿卷九，頁一三二至一三四。又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三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北巡撫于蔭霖奏摺，「唐才常漢口起義清方檔案」，轉引自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一冊，頁二六四至二六九。一九五七年，上海。又馮自由開國前史第一冊，頁六八。

蓋予既遭失敗，……適於其時〔又〕有保皇黨發生，與虎作倂，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¹⁰但國內外知識青年對於國事關心的日著，則爲革命造成一種新的形勢；而這一新革命形勢的造成，康、梁黨人也曾與有力焉。¹¹

甲午中國戰敗，乙未三月二十三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當時康有爲和梁啟超因會試在北京，四月初六日（四月三十日），啟超聯合廣東和湖南兩省舉人，上書請拒中日和約。由此掀起的「公車上書」的熱潮和康有爲組織強學會的運動，其事的本身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自覺的運動。強學會人士且曾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發行日刊中外紀聞和強學報。強學會在當年十一月被封禁，明年（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春，啟超應黃遵憲之招，南下至上海，與汪康年合力創刊時務報。啟超由是「名重一時」，開始造成其言論界之驕子的地位。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月，啟超入湘主講長沙時務學堂，參預陳寶箴、江標、徐仁鑄、黃遵憲等人所推行的新政運動。湖南新政運動由是而爲戊戌百日維新的前導。¹²啟超、唐才常、譚嗣同、熊希齡等人在時務學堂時期和同志昌言民權革命，復立南學會灌輸新學，鼓吹改革，並創刊湘學新報和湘報，以相應和。其後湖南新政雖因戊戌政變發生，隨百日維新的失敗而中輟，啟超本人也終未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新思想的種籽則已播。啟超在政變後逃亡日本，當年撰戊戌政變記，便會說：

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爲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徧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燒不

¹⁰ 孫文學說第八章，國父全集第二集，頁八五。民國四十六年，台北。

¹¹ 近人著作三種，對於辛亥革命前十餘年間康、梁與君憲黨人於國人思想之啓迪上所發生之影響，有深入之討論，可參閱：（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民國五十三年，台北；（2）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民國五十八年，台北；（3）亦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民國五十五年，台北。

¹² 參閱拙著「黃遵憲與梁啟超」，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十一期，頁八至九。一九六九年，香港。

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奪矣。¹³

戊戌後中國知識人士間此種思想態度的變化，不僅於湖南一省為然。戊戌維新發生於列強租港與劃分勢力範圍期間，此康有為所謂「外憂危迫，分割洵至，」非「及時發憤，革舊圖新，」無以「少存國祚」之時也。¹⁴百日新政有籌辦京師大學堂和各省開辦中、小學堂二端，政變後雖也有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的命令，但教育賴地方維持，幸尚未全遭罷廢。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的蘇報「論說」，便會指出這一事實說：

中國維新以來，京師至各行省，皆設學堂，所以養人才，公學問，開風氣，致富強，其有利於國家，夫固盡人而知之也。¹⁵

政變後梁啟超在日本，於戊戌當年十月在橫濱創刊清議報；辛丑冬清議報停，明年（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一月新民叢報創刊。啟超以其「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和他的同志繼續在報端為新知識、新思想、和改革國事鼓吹，同時則攻擊慈禧太后和滿清政府。新民叢報創刊於長江自立軍敗後，啟超自謂：

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¹⁶

其所自言自非虛語，即革命黨人也都承認之，如老同盟會員陳春生對於康、梁黨人之於

¹³ 戊戌政變記，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飲冰室專集之一，頁一四三。民國三十年，昆明。

¹⁴ 見世所傳康有為上德宗第五書。上書日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作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黃彰健考證為十一月，見黃著「論光緒丁酉十一月至戊戌閏三月康有為在北京的政治活動」，戊戌變法史研究，頁五六。民國五十九年，台北。

¹⁵ 著者所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黨史會）藏蘇報，因收藏者曾加裝訂之故，相間一面之日期不可見，故文中所作日期可能上下一日，以下同。

¹⁶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四，頁六二。

革命事業，即會喻之為「開荒之犢。」¹⁷在新民叢報創刊後一年，上海新世界學報載有馬世傑（軼羣）「與陳君逸庵論杭州宜興教育會書」一文，謂「杭州開化之速，未有如去歲之甚也，……推其故，溯其因，乃恍然於新民叢報之動人也。」而光緒二十九年，在上海創刊的革命刊物國民日日報，至於以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劃分戊戌前後國民思想精神變化的進程。¹⁸

庚子亂後，國人出洋留學的風氣日盛，地方政府相率有留學生的派遣。如舒新城於其所著近代中國留學史一書中所述，「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經過拳匪之亂而後，變法之要求益切，一切新政均需人辦理。於是疆吏之奏新政者，無不以游學為言。」¹⁹留學生有被派遣往西洋者，如湖北的派遣朱和中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和胡秉柯等人赴比是，但多數則往日本。辛丑後一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中國留日學生已達約六百人。是年九月初一日（十月二日）上海蘇報有「東京留學生答振貝子詞」一文，內曰：

我國甲午以還，漸知鎖國主義不可行，於是東渡留學者陸續而來。庚子以來，國家有獎勵留學生之上諭，於是來者日衆，北起奉、直，南至黔、蜀、三江、兩粵、閩、浙、齊、楚之間，來學者已有六百人之多。

這壬寅的六百人，至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在東京正式立時，約三、四年間，竟驟增至七、八千人。²⁰中山先生於光緒三十一年組織同盟會，初開會於比京布魯塞爾（Bruselles），正式成立於日本東京，再傳播於國內外各地，便是以這一有政治

17 陳春生 中華民國開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之資料，毛筆鈔件，中央黨史會藏。

18 新世界學報第三期，頁一一三至一一七。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一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二日），上海。又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三集，「社說」，頁三一至三七。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上海。

19 舒新城 近代中國留學史，頁四六。民國二十二年，上海。

20 陳天華「陳星台絕命書」謂乙巳中國留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新頒「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罷課，「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民報第二號，文頁二。一九〇六年一月，日本東京。）又舒新城上揭書，引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大隈重信撰「宏文書院講義錄序文」，及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〇八年一月三日）滿清學部奏摺，謂中國留日學生，光緒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達萬餘。」（頁五四至五五。）

覺悟的新知識羣為中心。中山先生於同盟會成立後函告南洋同志，特別指出新革命組織的此一性質，曰：

近日吾黨在學界中，已聯絡成爲一極有精彩之團體，以實行革命之事。現捨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學問充實，志氣堅銳，魄力雄厚之輩，文武才技皆有之。……此團體爲秘密之團體，所知者尙少，如能來投者陸續加多，將來總可得學界之大半。有此等飽學人才，中國前途，誠爲有望矣。²¹

(二)

興中會之以會黨爲中心，革命黨人從不諱言之。中山先生於同盟會成立之際，便會在一次講演中自稱，「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²²會黨與清季革命的關係，自然至深且巨。在同盟會成立前二年（即癸卯），中山先生爲了便於在海外號召，與美洲的保皇會勢力鬥爭，並曾在檀香山親身加入洪門。²³次年，中山先生去美洲，倡議洪門會員總註冊，並手訂致公堂新章。迨同盟會成立，其總章第五條，仍明白規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爲一體者，概認爲同盟會會員。」²⁴至於同盟會時期歷次在國內的武裝起義，下層自然仍都有會黨的成份參加。辛亥（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中山先生再去美國，得知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因往舊金山，組織洪門籌餉局，以備再舉。當時同盟會和致公堂會聯名登報佈告，由致公總堂開特別會，招納同盟會會員之未加入洪門者，全體入會。²⁵事實是

21 「覆陳楚楠函」，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二九至三〇。

22 馮自由（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第一號，頁七〇。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五日，日本東京。

23 中山先生加入洪門之年，說者不一，有主甲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者，亦有主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年後者。見鄭魯黨史稿，頁三一至三二。本文據國父年譜初稿（中央黨史會編，民國四十七年，台北），頁一二七至一二八，從陸丹林說。案梁啟超於己亥（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歲尾去檀香山，次年即加入洪門，比中山先生尙早五年。

24 鄭魯黨史稿，頁三七。

25 馮自由「美洲華僑與辛亥革命」，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二三。

如宋教仁和朱和中等人所記述，在庚子、乙巳年間（光緒二十六至三十一年），中山先生有時尚持會黨比秀才和軍隊為可靠的主張。²⁶同盟會之終於以知識分子代替會黨為革命組織的主力，一方面固然是庚子後的新形勢使然，同時毋寧也是當時有革命覺悟的新知識羣所主動爭取的結果。本來所謂士大夫讀書階級，「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維新派的地盤基礎。」²⁷但就在辛丑至乙巳保皇會氣盛而興中會意態蕭條的數年，在新知識人士間，排滿革命的思想大起。其所以如此，自然與戊戌維新失敗和拳亂的刺激有關，使知識人士最後對滿清政府絕望。這一潮流，在當時國內外學潮的疊起和報章雜誌言論的激烈上，最可顯見。

壬寅、癸卯間（光緒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一九〇二至〇三年），中國學生在日本和在國內各地，迭有風潮。在日本先有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發起，繼之又有東京學生反對清使館拒絕保送私費陸軍學生的事件，和東京青年會及拒俄義勇隊的組織。主其事者如程家樺、章炳麟、馮自由、馬君武、張繼諸人，其後皆成為同盟會員。在國內，上海教育文化界人士曾於壬寅夏天在張園舉行了一次協助留東學生的大會。未幾，又有上海南洋公學二百餘學生同時退學的事件；南京江南陸師學堂、乃至省、府、州、縣學堂（如廣西梧州中學），也相繼有學生退學的事件發生。學潮的發生，直接的原因不一，但根本原因則如壬寅十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的蘇報「論說」所指出，是新舊之爭的結果。學堂有新舊黨人，「舊黨滿口忠孝聖賢，新黨滿口平權革命。」所以學潮雖不必盡因革命的動機而起，但一旦發生，則相激相盪，其勢非至於革命不止。東京青年會的組織產生於壬寅中國留學生和清使館衝突之後，便揭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會章，認為「異〔滿〕族政府之不足與有為」，而主張革命。²⁸從江南陸師學堂退學的章士釗（行嚴），在蘇報案發生前主蘇報的筆政。²⁹而由杭州中學堂

26 宋教仁程家樺革命事略，頁二上至二下。中央黨史會藏初印本，出版時地名缺，有民國二年一月張繼跋。又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總頁二五六。民國四十二年，台北。

27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頁二〇八。民國四十六年重印本，台北。

28 錫金光復同人編印秦效魯〔毓澐〕先生革命事略。出版時地名缺，有民國二十六年吳千里跋。

29 張篁溪（伯植）「蘇報案實錄」，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一冊，頁三六八。一九五七年，上海。

退學的師範班學生在上海創刊新世界學報，在壬寅方蒙新民叢報譽以文章銳達，理想爛斑，而引為同道，便隨即高揭民族主義，駁擊君憲，因為「立憲與民族主義有絕大之反對存焉。」³⁰

至於報章雜誌言論的變化，則上海蘇報可以為例。蘇報創辦時為一托庇於日本領事館的小報，因為不善經營虧折，為湘人陳範出資購得，繼續營業。其言論，據蘇報案紀事所述，「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草蛇灰線，層級井然；」而「其大張旗幟，實始於去年〔壬寅〕之冬。」³¹此所謂大張旗幟者，乃指增闢「學界風潮」一欄而言。章士釗記其事曰，「辛、壬之間，江南學堂多事，〔蘇報〕承南洋公學以墨水壺退學之餘波，增闢「學界風潮」一欄，藉資號召，聲價大起。」³²案壬寅之冬的蘇報，所載論文如「論廢立之必不能行」（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辨訛言」（十二月初九日；一月七日）、「論歸政是保清第一策」（十二月十七日；一月十五日）、「守舊者言」（十二月十九日；一月十七日）等篇，都還是保皇論調。「學界風潮」實關於癸卯年初；而蘇報之昌言革命，也似始見於「敬告守舊諸君」一文，載癸卯四月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二日）該報。³³五月初一日（五月二十七日），章士釗出任蘇報主筆，時距蘇報案的發作已不過一月了。

但蘇報之以增闢「學界風潮」一欄大張旗幟，其事本身實顯示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由此可以發見革命運動的發展與一個新知識階級的興起二者間呼應的關係。在章士釗任主筆的一個月內，蘇報的反滿革命的言論，真如狂潮。章士釗的「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釋仇滿」、「漢奸辨」、「駁革命駁議」，章炳麟的「康有為」、「革命軍序」，章士釗摘錄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政見書」而成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等文，皆發表於此時。自然，與蘇報的激烈言論相先後，以上海和東京兩地為中心，國內外出版物對於排滿革命昌言無忌者尚多。如日報，香港有中國日報，為革命黨的機關

³⁰ 新世界學報第八期，「附錄」，頁一一七至一一八。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又第九期，頁三四至三五。同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月三十日），上海。

³¹ 蘇報案紀事（一名癸卯大獄記）上卷，頁一。著者及出版時地名缺。該書應撰於蘇報案發生當年，辛亥革命一書編者定其為章行嚴（士釗）撰（第八冊，「徵引書目」，頁六一五）。

³² 章行嚴「蘇報案始末記敘」，辛亥革命第一冊，頁三八八。

³³ 著者所見中央黨史會藏蘇報於壬寅、癸卯間有殘缺。「學界風潮」之始見於該會所藏之蘇報者，為癸卯（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公元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一日。

報；上海繼蘇報後有國民日日新聞和由俄事警聞改組的警鐘日報；新加坡有圖南日報。期刊如東京的湖北學生界、國民報、江蘇、二十世紀之支那，上海的中國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書冊如劉光漢的攘書，章炳麟的愾書和駁康有為政見書，鄒容的革命軍，楊守仁的新湖南，章士釗的蘇報案紀事、沈蓋，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都是。而黃藻編癸卯初刊的黃帝魂，尤其集「近十年來新聞雜誌及各種新撰述之精魄，」「文皆沈痛之聲，風雨如晦，鷄鳴不已。」³⁴

庚子後滿清政府威信的掃地，新教育和新知識在全國各地的傳播，以及反滿書報的發刊，在在啓發知識人士的民族意識和促進他們的嚮望革命之心。在保皇與革命的兩條途徑之前，有人懷救國之志而絕望於滿清者，自必投向革命的一途；而經倫敦蒙難，中山先生已成為革命排滿的象徵，故欲革命，則中山先生是一個當然的領袖。此如章士釗在當時所指出，中山先生「首倡革命於舉世不言之中，爭此不絕如髮之真氣，」所以「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不能不「懸孫以為之招。」³⁵至於上述此新知識羣之投身於革命會自動爭取之一事，則可於胡漢民等人的記載見之。朱和中、宋教仁、陳天華、胡漢民等人各以不同的立場，以及和中山先生的不同的關係，對此會有相同的作證。

中山先生於光緒三十年冬，因留歐學生的邀請，自倫敦去歐陸，於比京布魯塞爾晤朱和中、胡秉柯、賀之才諸人，商討革命進行方法問題。據朱和中事後所記，中山先生當時仍有「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的主張。但朱氏力說應從「更換新軍腦筋，開通士子知識」入手，認為會黨為「無知分子，豈能作為骨幹。」朱氏並指陳中山先生過去歷次革命之所以不成者，正因為未能獲得知識分子的贊成，故「必大多數知識分子均贊成我輩，則事半功倍矣。」這次辯論據說歷時三日三夜，結果決定「雙方並進。」³⁶

中山先生於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夏秋間，自歐洲經南洋抵達日本，同盟

34 黃帝魂「例言」。中央黨史會藏黃帝魂有二本，一本一九〇三年印行，一本一九一〇年印行。一九〇三年本已收有有關蘇報案之文字，故知其必問世於蘇報案發生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一九六一年，北京）收有章士釗「疏黃帝魂」一文（頁二一七至三〇四），對於該書編者、書中各篇之作者與原發表書刊及時地，皆有說明，可參閱。

35 黃中黃譯孫逸仙，頁六至八（一九〇六年，日本東京）。本書即白浪滔天三十三年之夢之摘譯，上引文不見原文，當係譯者自加之語。白浪滔天即宮崎實藏，黃中黃即章士釗。

36 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革命文獻第二輯，總頁二五五至二六〇。

會便在這一年的七月廿日（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正式成立。據宋教仁程家樑革命事略的記載，當時中山先生與中國留學生——尤其華興會人士——之間也曾有對於革命方法的討論，而所爭者也仍在革命究應倚重會黨，抑倚重知識分子的問題。³⁷華興會為湘人的革命組織，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曾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圖在長沙舉事，失敗。但華興會本身則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組織，於會外另設同仇會，以吸收會黨。³⁸在討論中，中山先生主張聯絡少數留學生返國，在軍事方面領導會黨起義，在政治方面整理地方和辦理對外交涉，但程家樑和華興會人士以為不足。易言之，他們要求推廣革命在知識階級中的基礎。³⁹在東京的一次討論中，在座者除中山先生和程家樑外，尚有陳天華、黃興、宋教仁、白逾恆、田桐、張繼、但燾、吳暘谷諸人，爭辯「自午迄酉，尚未能決。」⁴⁰

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冬，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的要求，頒佈「留學生取締規則」。以華興會員而為同盟會員的陳天華，「內愴懷於祖國之孱弱，外不堪日人之狎侮，」此以「堅固人心，保全國體，」遺書投東京大森海灣而死。⁴¹其遺書中特別申述他對於會黨與知識分子的問題的主張，曰，「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為本營；日、俄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又曰，「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⁴²陳天華是同盟會成立前在東京參加會談的人，他的所言，自然足以為當時留日革命人士的言論的一證。

胡漢民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入會後，成為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之一。胡漢民

37 宋教仁程家樑革命事略，頁二上至六下。

38 邵循正「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與農民的關係問題」，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以下簡稱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一〇四至一〇五。一九六二年，北京。

39 宋教仁日記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記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初晤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對在座諸人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與程家樑革命事略所記者字面略有出入，然主旨仍同，可以參證。見宋教仁我之歷史第二，頁二七下至二八下。民國九年，湖南桃源。（民國五十一年影印本，頁六八至七〇，台北。）

40 同註37，頁六下。

41 獨立蒼茫子「東京學界公憤始末告鄉人父老與學書」辛亥革命第二冊，頁二二四。

42 同註21，文頁四。

所認識的同盟會，其構成，「以知識階級（留學生與內地學生）為主體，次則流氓無產階級（會黨與失業農民）與華僑之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為多數之成份，而皆集於知識階級旗幟之下。」他認為，「在當時〔爲求〕達到國民革命之戰畧，則政策亦無勝於此者。」⁴³ 同盟會成立後三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有河口起義。河口之役敗後，胡漢民在新加坡，與中山先生計劃以後革命進行的方畧。據「胡漢民自傳」所記，他當時曾「以所經驗者證明會黨首領之難用，與其衆之烏合不足恃，」主張當注全力於正式軍隊，⁴⁴亦與朱和和中所主張者相同。

對於上舉諸人的記載，論者自然可以懷疑其措辭的正確和表達的完整的程度，但如朱和和宋教仁的記載所稱，在布魯塞爾和東京的討論都會有多人在座，歷時數小時至數日，則當時對於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問題會有廣大激烈的討論，應無可疑。中山先生接受這一新興的革命力量的要求，於是有中國同盟會的組織。

（三）

庚子，乙巳間（光緒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一九〇〇——一九〇五年）中山先生與海外留學生的關係的變化，其事至可注意。庚子惠州之役敗後，中山先生自台北至日本。其後至癸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秋去美洲約三年間，中山先生除了曾去南洋一行外，即留居於日本。在這三年間，東京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已舉行，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事件已發生；留日學生的抗俄義勇隊已發起，上海張園的拒俄大會已召開；國內學潮已大起，蘇報案已發生。當時中山先生在日雖也有留學生和他往來，並曾為留學生的接受軍事訓練，協助開辦了青山革命軍事學校。⁴⁵但據胡毅生、章炳麟、宋教仁、張繼、和吳稚暉等人的記述，則當時留日學生和中山先生相識者既不多，對於相識者，中山先生也未曾勸令加入興中會。⁴⁶迨中山先生於乙巳年六月（一九〇五年七月）再至日本，而

43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三五。民國四十二年，台北。

44 同上，總頁四〇〇至四〇一。

45 胡毅生「同盟會成立前三事之回憶」，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一至三。

46 見胡上引文。又章炳麟「演說辭」，民報第六號，頁一至二。一九〇六年七月，日本東京。又宋教仁程家驊革命事略，頁一下至二上。又張繼「憶革命初期的幾位青年同志」，重慶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吳稚暉「蘇報案之前後」，重慶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七月同盟會即成立於東京。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三日）留學生在東京富士見樓舉行歡迎會，中山先生發表演說，中有曰：

〔兄弟〕離東二年，論時不久，見東方一切事皆大變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與諸君相會於此。近來我中國人的思想議論，都是大聲疾呼，怕中國淪為非、澳。前兩年還沒有這等的風潮。從此看來，我們中國不是亡國了。這都由我國民文明的進步日進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長一日，所以有這樣的影響。⁴⁷

庚子後知識分子的傾向於革命，「民族的思想日長一日」自是主要的原因。章炳麟、秦力山和陳天華是最好的例子。章炳麟早年與梁啟超輩遊，撰「客帝」一文，列於初版的尙書。客帝云者，以自古用異國之材充客卿為例，故主張滿洲之入主國內，應無不可。但他既而悔之，於再版尙書時「著之以自劾。」其「客帝匡謬」曰：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遊，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且漢帝雖孱弱，賴其同胤，臣民猶或死之。滿洲賤族，民輕之，根於骨髓。其外視無異歐、美，故聯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亡一於漢種。……由是言之，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削浸微，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⁴⁸

所以使章炳麟絕保皇而入革命者，是民族思想。

秦力山曾先後從梁啟超於長沙時務學堂和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庚子勤王之役，他任自立軍的安徽前軍統領，在大通發難，兵敗後再至日本。但次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他便和沈翔雲、駁元丞、王寵惠等人在東京創辦國民報月刊，為留日學生最早發行的作激烈言論的刊物，提倡革命排滿，詆斥保皇之說。壬寅年在東京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他也是原始的發起人之一。他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春去緬甸，

47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一。

48 章炳麟尙書，「前錄」，頁五。一九五八年重印本，上海。

始「播革命種子到緬。」⁴⁹他不是同盟會員，但卻是癸卯前中山先生與留日學生結識的一個重要媒介。章炳麟和張繼都因他的介紹，與中山先生締交。⁵⁰章炳麟撰「秦力山傳」曰：

〔庚子勤王之役既敗，〕力山亦以〔唐〕才常起兵用勤王號，名義不順，欲力振刷之，遂與〔梁〕啓超絕。自作少年日報，道漢族自治義。時香山孫公〔中山〕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遊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⁵¹

使秦力山由「勤王軍將」而入革命者，同是民族思想。

陳天華爲華興會員，曾參預甲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長沙之役，事敗後走日本。他是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參加會章的起草工作。他也被推爲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撰述人。他從未與保皇會人士共大事，但在同盟會成立前，他卻曾主張用全體留學生名義，向清廷請願實行立憲。⁵²他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因抗議日本的頒佈「留學生取締規則」，在日本投海自盡。他的遺書自述其最後一、二年中思想的變化，曰：

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唯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

49 徐市隱（贊周）編，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編撰處增編，緬甸中國同盟會革命史（下），頁一至二。民國二十一年，仰光。

50 張繼「回憶錄」，張溥泉先生全集（下），頁二三三。又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八年條下，頁八至九。一九六五年重印本，香港。

51 太炎文錄續編（四），頁六。民國四十五年重印本，台北。

52 馮自由「猛回頭作者陳天華」，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二六至一二八。

族，許為同等之國民。⁵³

這樣，陳天華以重視政治問題過於民族主義的革命黨員，也終於成爲一個極端的排滿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之成爲一時的支配的思想，不僅見於知識人士的投身革命的熱潮，也不僅見於保皇會人士的棄保皇而入革命，如秦力山是，同時也見於下一事實：此即當壬寅、癸卯間（光緒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一九〇二—〇三年），便是保皇會首要如梁啟超，也在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上，大倡排滿革命之說。當時保皇會內部的動搖，可從壬寅十月、十二月康、梁師弟間的通信中見之。壬寅十月康寄梁一信，說他因梁等言革命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十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一日）又一信更說，「自汝〔梁〕言革後，人心大變大散，幾不可合。蓋宗旨不合，則父子亦決裂矣。……故汝雖不攻我，而攻我多矣。我爲茲懼，不知汝如何？抑尙以爲公私當分，言革可救中國乎？同黨因茲分裂，尙何救國之可言也。」⁵⁴在當時康、梁師弟往返的書札中，壬寅十月啟超致康的一封信，辯護自己的革命排滿的主張，最足以見啟超當時的思想。以下是該信的節錄：

民主、撲滿、保教等義，真有難言者。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誠，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故不如披心瀝胆一論之：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爲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爲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然以爲破壞終不可免，愈遲則愈慘，毋寧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豈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門人中猖狂言此有過弟子十倍者。先生特未見文興報〔舊金山〕耳。徐〔勤〕、歐〔傑甲〕在文興所發之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爲警慄。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續，滿賊清賊之言，盈篇溢紙。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新民報之含蓄亦甚矣。樹

53 「陳星台先生絕命書」，民報第二號，頁三。

54 轉引自梁年譜稿上冊，頁一六六、一八一。

園〔韓文舉〕吾黨中最長者也，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新民報中「捫蝨談虎」一門及「人肉樓」等篇，樹園筆也。同門之人，皆趨於此。夫樹園、君勉〔徐勳〕，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如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於今日時勢，實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來示謂此報為黨報，必全黨人同意，然後可以發言。無論黨人分處四方，萬無作成一文，徧請畫諾，然後發刻之理。即以黨人之意論之，苟屬立憲政體，必以多數決議，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⁵⁵

梁啓超於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遊歷美洲，十月（十二月）復返日本，自言「自美洲來而夢俄羅斯」⁵⁶自是遂不再言革命。在壬寅、癸卯間，繼康有為「辨革命書」和章炳麟「駁康有為政見書」的發表，保皇和革命的兩條陣線間，展開了連年的論戰，而於同盟會成立後，丙午、丁未間（光緒三十二、三十三年；一九〇六——〇七年）達於激烈的高潮。這次論戰，革命黨以民報，保皇黨以新民叢報為各自的主力。辯難的方面雖兼及國體和民生，但決勝的關鍵顯然仍在民族。結果革命勢力終於以民族的大纛，經宣傳和論戰，從保皇會和以後的君憲派奪得了思想的領導。

由此可見，革命組織中知識分子的基礎的擴大，其直接的結果，首先便是革命勢力對保皇黨或君憲派的思想鬥爭的勝利。早在丙午年，梁啓超在致康有為的一封信中，已有如下的陳述：

革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丙午七月十三日；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九月二十日；十一月六日〕，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近頃江西、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機叢起，皆彼黨所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然我苟非與政府死戰，則亦不能收

55 轉引自梁年譜稿上冊，頁一五七至一五八。

56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卷十三，頁八五至八六。民國三十年，昆明。

天下之望，而殺彼黨之勢，故戰政府亦今日萬不可緩之著也。⁵⁷

一年後（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楊度在致梁啟超的一通長信中，也說：

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有曰滿人不能立憲者，有曰立憲不利於漢者，雖皆無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勢力。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較益增也。

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爲無理由之宗教也。

尚有所密告於兄者，兄近作「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此文出而議者又目爲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報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此學界最有勢力之議論，他人不肯以告也。⁵⁸

因此同年夏間梁啟超寄康有爲一信，自詡在日本對革黨已「全收肅清克復之功，」自然是無稽之談。該信的一段說：「革命黨之勢力，在東京既已銷聲匿跡，民報社各人互相噬嚙，團體全散，至於並報而不能出。全學界人亦無復爲彼所蠱惑者。蓋自去年新民叢報與彼血戰，前後殆將百萬言，復有哲子〔楊度〕所辦中國新報，旗人所辦大同報助我張目，故其勢全熄。孫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黨全收肅清克復之功，自今以往，決不復能爲患矣。」⁵⁹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同盟會東京總部有內爭，但與新民叢報無關；民報的在日本被禁發行（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九月，一九〇八年十月），也還遠在新民叢報停刊（丁未七月）的年餘之後，在它的後身政聞社的機關刊物政論雜誌被清廷查禁（戊申六月）的數月之後。而且事實上，經政聞社的曇花一現，康、梁從戊戌以來的政治運動，卻真是一時烟消雲散，其勢全熄。反之，同盟會雖有丁未、戊申數次起事的失敗，但再接再厲，庚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有廣州新軍之役，辛亥又有廣州之役，下與武昌起義相接。

57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轉引自梁年譜稿上冊，頁二一八。

58 轉引自梁年譜稿上冊，頁二三七至二四一。

59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八日與夫子大人書」，轉引自梁年譜稿上冊，頁二四五。

對於辛亥革命，論者有以革命黨人的激烈排滿思想籠罩一切，或梁啟超之未曾與革命黨人合流為可惋惜者。⁶⁰此皆事後的旁觀者之言，無當於事實。辛亥革命雖變更國體，易帝政而為共和，然結果乃以一次民族革命而告成功。老同盟會員湯增璧為民報和同盟會的革命宣傳申辯，謂民報的創刊乃以同時闡發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宗旨，斯固然矣。然讀民報者則「以民報偏重民族革命之宣揚；」而且在陶成章任編輯（第二十至二十二期，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四月至七月）後的最後數期，民報也確曾專「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為事。」⁶¹迨辛亥革命軍興，革命勢力之同意在倒滿後以國家元首之位讓予袁世凱，革命黨人在各地之迅速與君憲派人士及舊滿清官僚合作，部分革命黨人的脫離多年來曾為之出生入死的革命組織，乃至革命組織之在宋教仁等人的領導下喪失了革命的性質，皆可以此同一事實即視倒滿為革命的成功解釋之。但就事論事，如無辛亥前十年排滿革命的熱潮，則恐亦將無辛亥革命。胡漢民稱同盟會「排滿宣傳戰勝一時之思想者，」為「根本之成功，」⁶²自屬的論。如上引文所見，接近康、梁的人士如楊度，即已見到「排滿革命」四字在社會上可以成為無理由之宗教；而革命黨人，更知道民族主義乃源於一種感情，一種根性。⁶³「義理如舟，感情如水，」⁶⁴當舉國為相同的感情而風動之時，也便是革命因勢利便而收功於中土之日。

(四)

據中山先生「自傳」所稱，庚子惠州之役是他的第二次武裝起事，下隔七年，乃有第三次起事，是為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潮州、黃岡之役，⁶⁵時已入同盟會時期。同盟會時期的武裝起事，可以戊申（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的雲南河口之役劃分

60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p. 69, 245-246., Seattle, 1969.

61 曼華「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革命文獻第二輯，總頁二一九至二二三。

62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四二九。

63 蟄伸「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民報第一號，頁三九；又中山先生「民報紀元節講演」，國父全集第三集，頁八。

64 民意「記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第十號，頁一一三。

65 孫文學說，國父全集第二集，頁九〇。

為前後兩期：前期丁未、戊申兩年的歷次起事，主力仍用會黨；而後期庚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廣州新軍之役用新軍，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之役用同志（青年學子）。同年的武昌起義也由新軍舉事，而革命卒底於成。⁶⁶自然，同盟會員和新軍官兵可以同時身隸會黨，武昌新軍起義後會黨也仍活躍一時，⁶⁷但庚戌和辛亥的三次起事都未曾以會黨為號召，乃一極可注意之事。革命起事的主力顯然已易會黨而為新軍，而新軍之為革命的潮流所吸納，則是革命宣傳和獻身革命的知識青年滲入新軍的結果。

武昌起義當時在長江流域代表同盟會的是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記同盟會中部總會，曰：「時湖北先有共進會、文學社兩派，共進會孫武、鄧玉林等組織之，江湖士佔多數；文學社蔣翊武、劉復基〔堯激〕、蔡大輔等組織之，軍、學界佔多數。余勸其和衷共濟，相輔而行，卒得按照同盟會章程，從新組織，而湖北中部同盟分會，遂得成立矣。」此見辛亥前夕武漢革命的進行，以共進會和文學社兩派勢力為實行的團體，而直接的領導者為同盟會中部總會。⁶⁸兩派的首要多數具有同盟會籍，共進會的創立者更全部是同盟會員。⁶⁹但如譚人鳳所指出，共進會的方畧仍以號召會黨為主，而文學社則係自日知會演變而來，為結合軍、學兩界的革命團體。早在同盟會成立前，湖廣革命志士劉靜庵（敬安）、呂大森、胡瑛、張難先、宋教仁等人，在武昌先有科學補習所的組織，運動軍隊革命。科學補習所被禁，繼之者為日知會。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後，派余誠為湖北分會會長，至武昌，即藉日知會為革命的活動。日知會運動的對象與科學補習所同，仍是軍、學兩界，但活動的範圍則遠較科學補習所為廣大。據曹亞伯的記載，日知會最盛時有會員約萬人，分會密佈於軍隊，如熊十力（子貞）等人所組織的黃岡軍學界講習社即其分會之一。日知會會員不限於鄂人，所以其影響並遠及他省。⁷⁰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年終，日知會事又敗，首領被捕。次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

66 會傑洪門對於國民革命的貢獻。出版時地名缺，卷末附記「二二〔年〕、六〔月〕、一〔日〕、會傑伯興於上海」。

67 參閱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一六六至一八七。

68 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冊，頁二五六三。民國五十六年，台北。

69 馮自由「辛亥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三五三至三六六。

70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轉引自辛亥革命第一冊，頁五七七至五八〇。

八年），武昌又有軍隊同盟會的組織。軍隊同盟會於當年終改組為羣治學社，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再改組為振武學社，文學社即係於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年初，由振武學社改稱。同年閏六月（公曆七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七月，文學社與共進會舉行聯合會議，統一指揮，此即譚人鳳所稱經其勸導，兩派從新組織，成立湖北中部同盟分會者是也。

馮自由記辛亥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謂羣治學社為「湖北新軍創設革命團體之嚆矢。」由羣治學社而振武學社，皆以新軍為主體。⁷¹武昌起義由新軍舉事，他省響應者也以新軍為主，⁷²可見當武昌起義時，新軍的傾向革命已是普遍的趨勢。中國之有新軍，始自天津小站，時在甲午戰後，為北洋陸軍所自來。繼之他省也編練新軍，其中開始最早兼成效最著者為在張之洞治下的湖北。張之洞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自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甲午戰後，張氏聘德軍官至湖北，仿新法練兵，所以湖北的新軍，與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幾乎同時創立。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清政府以北洋、湖北訓練新軍已具規模，應逐漸予以推廣，因命河南、山東、山西各省選派將弁赴北洋學習操練，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赴湖北學習操練，學成後，發回各原省管帶新軍。當時各省有關編練新軍的奏請，「不曰仿照湖北、北洋成法，即曰派員馳赴湖北、北洋調查成案。」⁷³

上文曾指出，新軍之為革命的潮流所吸納，乃「革命宣傳和獻身革命的知識青年滲入新軍的結果，」同時更基本的自然也是新軍知識進步的結果。新軍中知識分子的成分的增加，一個來源是招兵時的選擇和知識分子的志願從軍。新軍之不同於舊軍，除教練

71 同註69，頁三六一。

72 陳旭麓、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主要戰鬥力是新軍士兵，各省響應的戰鬥力大都也是新軍和防軍、會黨、學生及臨時招募的隊伍。各省情況雖有不同，總的說來，可概括為下述三種情況：第一，以新軍為基本力量宣布起義的，如雲南、浙江、山西、新疆等多數省份均如此，但這些起義省份的起義力量也有會黨參加。第二，以新軍和會黨的聯合為起義力量，湖南、陝西就屬於這種形式，所以湖南起義首領的革命黨人焦達峯和陳作新，一個是會黨的組織者，一個是新軍軍官；陝西起義時則是以新軍參謀官張鳳翽為大統領，哥老會首領錢定三和萬炳南為副統領。第三，立憲官僚搶奪革命果實宣佈獨立的省份，也是在害怕新軍起義，發生流血鬥爭的基礎上進行的，江西、廣西兩省可為代表。」（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一六四。）

73 同上，頁一五三。

洋操外，首先即在選拔標準的嚴格。新軍的選拔，於年齡、體格、及識字程度，皆有規定。關於識字程度，如湖北即規定應募者皆應作文一篇。此種規定縱難嚴格執行，但識字之定為兵士應具的條件之一，已屬空前的變化，學生和士子因此而得應募入營。如乙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在黃陂的一次招募，「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個廩生，十四個秀才；」而新軍三十二標，據估計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兵士能識字讀書。⁷⁴

其次，新軍的官佐都選派軍校畢業學生或曾在軍校受訓者充任，所以軍校學生散入新軍部隊。拳亂定後，清政府命全國普設武備、陸軍等學堂，訓練新軍人才；地方疆吏也有自行設置者。如在湖北，遵照部令設置的陸軍小學堂和中學堂先後成立於光緒三十四年和宣統元年（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但張之洞早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已在武昌創設武備學堂，其後並陸續開辦防營將弁學堂和武備學堂教練隊。武備學堂取文武生員、候補員弁、官紳子弟、舉人與書院在學學生，入堂肄業，因學員「本有資階，可備將領之選。」防營將弁學堂調防、綠在職員弁入堂學習；而教練隊，後稱陸軍特別小學堂，「考選新軍中優異士兵與正、副目充學兵，三年畢業，復回原營，選充下級幹部。」⁷⁵

軍校學生散入新軍部隊的，尚有留日肄習軍事的員生。日本的成城學校和振武學校便是專供中國學生為肄習軍事作準備的學校，有不少中國學生由此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接受進一步的軍事教育。拳亂定後，清政府既詔行新政，並令全國建立新軍，各省督撫為迎合風氣和樹立各自的勢力，除派遣員生出國留學外，對於留日軍校畢業的員生更爭相延攬。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延攬吳祿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延攬蔣方震，浙江巡撫張曾敷的延攬蔣尊簋，雲貴總督李經羲的延攬蔡鐸等都是。他們而且一般都獲得優越的職位，充當新軍的協統、標統、管帶，或督練公所的督辦、教習，或在講武堂、陸堂小學堂供職。有的至於擢升為鎮的統制，如吳祿貞即其一例。

新軍中知識分子的成分的增加和知識程度的提高，為革命宣傳和革命組織的滲入軍隊，供給有利的條件。以湖北為例，武昌先有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的革命活動，其運動

74 同上，頁一五八至一五九。

75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六，頁一〇五；卷七，頁一二九、一五一。民國五十八年重印本，台北。又王纘承遺稿，沈嘯春整理，「辛亥首義陽夏光復紀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頁十七。一九六二年，北京。

的對象為軍、學兩界，已如上述。科學補習所人士如張難先和胡瑛，並因運動新軍而投身工程營為兵士。⁷⁶日知會與同盟會已有組織上的關係，亦如上述。曹亞伯為日知會員，亦為老同盟會員，據其記載，「當時日知會分會密佈於軍隊。」羣治學社的徵求社員，限於軍界與武學堂，並在武昌新軍的標、營、隊、與陸軍學堂，設置各級代表。其後的振武學社與文學社也都維持相同的組織。振武社員如蔣翊武（伯夔）為上海中國公學學生，劉復基（堯激）為留日學生，同盟會員，並皆投身新軍為兵士。⁷⁷

軍事學校同時也成為革命思想和革命組織傳入軍隊的一條直接的途徑。蔣方震述「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曰：「革命說之行也，首受其影響為學校；」在學校受訓者每選自行伍，「則皆營中之故人也，既自學堂歸，出其所得從容而討論焉。」蔣氏並認為「歷次革命皆自外鑠，其勢不堅；而武昌革命則其勢由內而外，由下而上，」故能成功。⁷⁸大抵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的軍事學堂或講武堂，多數已成為傳播革命的機關。如雲南陸軍講武堂，據李根源的記載，早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即已為革命黨人所控制，成為後二年響應武昌起義的革命的基礎。留日肄習軍事的員生不少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李根源就是一例，返國後卻獲委任為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旋擢升為總辦。⁷⁹李書城記當時中國留日的陸軍士官生，第四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五十七人，第六期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會者，不下百餘人。這百餘人中，李書城事後記得的有九十餘人，其名單如下：

（第四期）張世膺、周承炎、張承禮、蔣作賓、吳鍾鎔、金永炎、覃師範、王家駒、高佐國、吳經明、何澄、劉一清、劉毅、翁之谷、成桃、史久光、周斌、劉維燾、曾繼梧、劉繩武、鄧質儀。

（第五期）王孝縝、黃愷元、何成濬、陳乾、李浚、陳之驥、姜登選、李書城、袁華選、全恕、石陶鈞、王凱成、吳和宣、殷承燾、楊源濬、朱先志、齊琳、高齋。

⁷⁶ 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五五至五七。民國三十五年，上海。

⁷⁷ 同註69。

⁷⁸ 轉引自汪詒霖「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問題」，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122—123。

⁷⁹ 李根源「辛亥前後十年雜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頁三二五。一九六一年，北京。

(第六期) 尹扶一、李兆祥、王兆祥、劉祖武、孫榮、吳藻華、陳強、歐陽武、張華輔、趙復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萬泰、劉存厚、盧啓泰、劉宗紀、胡學伸、官其彬、黃國樑、劉汝贊、羅佩金、閻錫山、孔庚、李鴻祥、葉荃、楊會蔚、李敏、高聲震、仇亮、朱樹藩、姚以休、程子楷、張開儒、紀堪頌、李乾璜、耿觀文、張鳳麟、黃毓成、顧品珍、朱綬光、溫壽泉、唐蟒、唐繼堯、童錫梁、孫方瑜、趙恆惕、田遇東、李烈鈞、程潛、劉洪基、華世中。

對於熟悉民初史事者，這實在是一份饒有意義的名單。此外還有陸軍測量學校的黃鄂和曾昭文。⁸⁰李烈鈞、程潛、唐繼堯、張鳳麟、孔庚等約三十人，並另組織鐵血丈夫團，回國分赴各省，參加新軍。⁸¹如程潛自述，他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終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川督趙爾巽調他和姜登選、舒和鈞、王凱成等四人入川訓練新軍，即暗中擔任同盟會長江上游聯絡員的工作。⁸²

革命勢力的爭取新軍，最後連共進會也決定改弦更張，參加活動。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共進會首領孫武等人認為會黨意氣用事，不從命令，只可聯合，不可作為心腹，因決定將原有的會黨軍事組織解散，而以目標轉注於新軍。⁸³

到武昌起義前夕，以湖北為例，新軍中加入革命或同情革命的人數，有如下的估計：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約一萬五千人，其中革命黨人約二千人，經過聯絡而同情革命者約四千餘人。此外的八、九千人中，反對革命者不過千餘人，極大多數為中立觀望者。⁸⁴可見湖北新軍中革命的勢力，已如何遠超過反革命的勢力。結果張之洞在湖北的維新事業，種豆得瓜，反為革命造成了有利的條件。張氏的門生張繼煦撰張文襄公治鄂記，對此曾慨乎言之。該書稱張氏所成立的新軍「多富於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領導革命者又多張氏「素所培植之學生，」⁸⁵自屬事實。此一形勢，中

80 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頁一八三。

81 陳旭麓、勞紹華前引文，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一六〇至一六一。

82 程潛「辛亥革命前後回憶片斷」，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頁七一。

83 邵循正前引文，辛亥革命論文集上冊，頁一〇九。

84 陳旭麓、勞紹華前引文，同書頁一六二至一六三。

85 張繼煦張文襄公治鄂記，頁一五至一六。民國五十五年重印本，台北。

山先生當時也早已見及。在宣統二年廣州新軍之役敗後，中山先生在南洋檳榔嶼對革命同志講演，即曾明白指出：「〔新軍〕今日表面上視之固為滿廷之軍隊，若於實際察之誠無異吾黨之勁旅，一待時機成熟，當然倒戈相向，而為吾黨效力。」⁸⁶

(五)

辛亥革命既起，梁啟超和康有為各有信寄徐勤，梁信中有「幸此次叛軍非由中山主動，非純然為種族革命〔反滿〕」之語，而康信中有「所幸武漢之事，出自將軍黎元洪，而湯化龍參之，皆士夫也，或可改為政治革命〔立憲〕」之語。⁸⁷迨民國開國，徐佛蘇追記武昌起義經過，復謂「追憶川、鄂兩省因爭路權而倡獨立，革命之最初時期，並未表現革命黨人有何種偉大之勢力與計劃，存於國內，尤無一團一隊之革命軍隊可言。且待至川、鄂宣佈獨立，袁、段已贊成共和之後，則革命黨中之第二首領〔黃興〕始由海外趕至武昌；待至長江下游各省完全獨立，武昌軍政府將改都江寧之時，則革命黨中第一首領〔中山先生〕始由海外趕至江寧。」⁸⁸此或為君憲黨人的一廂情願之想，或於革命既成事實後，意在貶抑同盟會肇造民國的業績，而為君憲黨人邀功。二者皆無視同盟會成立後連年在國內的佈置經營，和武昌起義前夕武昌地方革命組織與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關係。

同盟會和中部總會對於武昌革命團體的領導的關係，也可由辛亥八月十四日（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黃興自香港寄美國舊金山馮自由的信中見之。當時文學社和共進會起義之計已定，推居正和楊玉如至上海，請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西上主持。廣州起義失敗後，中山先生仍留美洲，運動籌款；黃興留香港，為同盟會在東方的最高負責之人。先在八月十二日（十月三日），黃興已有一信致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中有「得公等規劃一切，長江上下，自可連貫一氣，更力爭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之語。⁸⁹至於其致馮自由函，一則曰：

⁸⁶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一七至一八。

⁸⁷ 梁年譜稿卷二〇，頁三四〇、三四二。

⁸⁸ 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轉引自梁年譜稿卷二〇，頁三七六。

⁸⁹ 參閱左舜生黃興評傳，頁四八至五〇。民國五十七年，台北。

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急，私電均以成都為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速籌大款，以謀響應，尙未得覆。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

再則曰：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廣州之役本請居君在鄂總理其事，以備響應者。）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高者始收之。……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又胡經武〔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歲弟曾通函胡君，請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部下者有之，擬於最近發動，期兩部合而為一。據此則為數已多，乘此路潮鼓湧之時，尤易推廣，……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動，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此次據居君所云，勢在必行，即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絀，亦必擔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驗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急為設法籌集鉅款以助之。……〔弟〕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達中山，想我兄接閱，必為竭力援助。⁹⁰

此見在武昌起義前夕，武昌的地方革命組織既視同盟會和中部總會為領導的機關，而在同盟會和中部總會方面，對此也居之無疑。

近十餘年中，台灣和大陸皆有大量近代史料印行。其中如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所編刊的數十巨帙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和北京中華書局印行的辛亥革命回憶錄五集，對於同盟會時期的革命運動皆有豐富的新史料供給。同盟會和中部總會，

90 轉引自馮自由「武昌起義與黃克強」，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三四三至三五三。

於辛亥革命前夕與全國各地尤其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的關係，已更加明瞭。⁹¹即如大陸過去所刊佈的資料和有關的書刊論文，對於同盟會在運用會黨上所表現的猶豫縱有批評，但對於同盟會之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革命組織，和辛亥革命之為同盟會所策動和領導的革命，亦皆無異辭。⁹²因此迨武昌起義，他省響應，黃興經上海赴武昌，一經抵達，遂被推為起義軍隊的統帥；而中山先生自海外返抵國中，也隨即為各省代表公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當時凡此蓋皆視為當然之事，表示對於同盟會的領導地位的承認。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中山先生發表其所著孫文學說，其中一段道及他在清末海外留學生中組織同盟會的經過，曰：「及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播中華民國之思想焉。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經武昌起義，而革命卒底於成。⁹³這是一位革命領袖在他晚年對於自己的革命事業的追述，與前引「胡漢民自傳」所稱同盟會之構成，以知識階級（留學生與內地學生）為主體，和辛亥革命為「排滿宣傳戰勝一時之思想者，實為根本之成功，」所說亦同。

91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革命源流與革命運動，十六冊。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台北。內第九至第十六冊合為該編第四部分，革命之倡導與發展，包括興中會與同盟會兩時期。辛亥革命回憶錄五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一九六一至六三年，北京。

92 如在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上、下冊）中所見。內部循正、汪詒霖、陳旭麓、勞紹華、李文海、章開沅、陳祚津、陳輝諸文，對於辛亥革命的領導和同盟會的組織成分等問題，討論尤多。關於中共人物之會身預辛亥革命者的主張，可參閱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所收朱德和吳玉章二文。

93 孫文學說，國父全集第二集，頁八八。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Summary)

WANG TEH-CHAO

Behi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hich resulted in overthrowing the Manchu dynasty in China there were activities of a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e Tung-meng Hui, founded by Dr. Sun Yat-sen in 1905 in Tokyo, Japan. Prior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Tung-meng Hui there was another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the Hsing-chung Hui, with Dr. Sun also as one of its founders and leaders. After the failure of several uprisings, of which the last one was the Huichow Uprising of 1900, the Hsing-chung Hui fell into obscurity. The Hsing-chung Hui had its foundation in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lurking in lower social strata. Its failure indicated the failure of a policy to employ secret societies as the main strength in winning a revolution.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ung-kuo Kuominta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he two *huis* are treated as successive predecessors of the present party. But the question of succession has been at times disputed by members of the Tung-meng Hui, who claimed that the Tung-meng Hui was from the beginning a wholly new-created organization and, instead of secret societies, it was the rising new intellectual class which formed the core of the new party.

For the Revolutionar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failure to use secret societies as the main force of revolution was very bitter. About the time of the initiation of the Tung-meng Hui, there were wide and arduous debates among the Revolutionaries on the feasibility of continuing that policy. Together with these debates, there emerged a persistent demand on the side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for a leading part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en years had elapsed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the Hsing-chung Hui in 1894 and that of the Tung-meng Hui in 1905.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decade the spread of revolutionary ideas into the intellectual class was very limited. Dr. Sun himself was known as a great rebel and was understandably not taken as a fellow being by the time-honored literati community. It was the Reformers 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led by K'ang Yu-wei and Liang Chi-ch'ao who were looked for guidance and leadership. Moreover, before 1900, besides members of secret societies, the only supporters of Dr. Sun's revolution movement were overseas Chinese. Before 1898, the Reform leaders paid little attention either to secret societies or to overseas Chinese. They turned to these groups for seeking support, however, after the coup d'état of 1898 when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abroad and lost their favored ground at home. The result was that they sapped for a time the already limited strength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China. It was the rise of the new intellectuals who were to decide the issue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eformers and provid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ith its main motivating power.

During the few years after 1900, a series of events occurred which finally turned the tide against the Reformers and in favor of revolution. The failure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the Boxer Uprising and the subsequent humiliation of the nation succeeded as a result in stripping the Manchu government of its last traces of prestige and making it look more "barbarian" in the ey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Moreover, the schools established both in the capital and in provinces since the Reform period and the tide of youths going abroad to study in foreign countries gave rise to a new intellectual class which, in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ld literati. The new intellectuals had opportunities to know the working of differ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longed to have a better government for their own country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rotten regime of the Manchus. They had mor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s it was a world in the age of New Imperialism with Social Darwinism and racialism prevailing, they tended to be unequivocally nationalistic themselves. They also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get together, to form organizations, and to stage rio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y disgusted. The ferment came forth first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he few years after 1900 saw a great and rapid increas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from about six hundred in 1902 to about seven or eight thousand in 1905. Their anti-government and anti-Manchu agitations won applause and arduous response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ircles in China. The immediate causes of these agitations could be very different, but they had the same background of ideas which an editorial of the *Su Pao* described as the antagonism of the progressives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s. The agitations were also not necessarily motivated by the impulse for revolution, but, once started, as they were from the beginning meant to fight against an ancient and alien regime, they were destined to sally forth toward revolution.

Dr. Sun Yat-sen was back in Tokyo in the summer of 1905 after his trip to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He found that, though he had been away for only two years, things had changed tremendously in the East. He said that "it is undoubtedly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has brought out such a striking effect." The final triumph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ver that of the Reformer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was also the triumph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Dr. Sun's own words, when he began to teach revolution in terms of nationalism, those who responded favourably were limited only to members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upper-middle classes he got few followers. It needed to have, therefore, an army of intellectuals to propagate the new ideas and to defeat the Reformers in propaganda that nationalism could spread and penetrate into every social stratum. It was the new intellectuals who now became the vanguards of this national self-awakening movement. The transformation could be unmistakably seen in the fact tha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formers in Tokyo came over to the side of revolution about the time of the initiation of the Tung-meng Hui. In one of his letters to K'ang Yu-wei, Liang Chi-Ch'ao wrote, "Now [1906]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as enormous strength in Tokyo wher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tudents accept its leadership..... The revolutionaries, who sow their seeds there and reap the crops inland, constitute undoubtedly the gravest menace to us, which should not be taken lightly."

The first results of the rise of the new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dedication to the cause of revolution were,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Tung-meng Hui and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

lutionaries of the leadership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which they had lost to the Reformers since 1898. Secondly, Liang Chi-ch'ao's foreboding that the Revolutionaries were to sow their seeds abroad and to reap the crops inland soon came true. The new intellectuals abroad,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new knowledge, their literary ability, and the prestige they inherited from the old literati class, as well as the various jobs they got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spread revolutionary ideas into the inland far and wid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ways and means with which the Reformers had extended their influence during the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p d'etat of 1898 were made for better use by the Revolutionaries during the Tung-meng Hui period. Now it was the Revolutionaries who organized study clubs, distributed propaganda materials, gave speeches at disguised meetings, and acted as teachers in schools for the cause of revolution. One generous job the returned "students" found waiting for them was to be appointed officers in the New Army set up in the provinces as a part of the decreed reform after the humiliation of 1900-1901, and the network of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hence penetrated deeply and widely into the New Army. The new trend was manifest in the last three military attempts made by the Tung-meng Hui, including that in Wuchang in 1911 which at last overthrew the Manchu Dynasty. The New-Army Uprising at Canton in 1910 had its main body made of educated young soldiers in the New Army; that of the Canton Uprising of 1911 was made of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that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again made of New-Army soldiers. Of course, members of the Tung-meng Hui and soldiers of the New Army could also be members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and members of secret societies could still be active in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force of revolution. It is none the less significant that the three attempts of 1910 and 1911 did not claim the relationship.